

1408

銅鼓文史資料

龔源林

第三輯

政協銅鼓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铜鼓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	熊伟生				
副 主 编	彭忠恕	曾 鹏			
编 委	巩国娥	刘兆江	刘中天	束丙星	
	廖兰香	卢敏菲	万长明		

《铜鼓文史资料》编辑名单

责任编辑	巩国娥	肖晓		
编 辑	刘中天	卢敏菲	廖兰香	
	束丙星	万长明		

目 录

自述.....	王育万 (1)
南下回忆.....	陈国栋 (21)
上山下乡回忆.....	余阳金 (38)
南繁纪事.....	汤 华 (42)
笔走龙蛇颂铜鼓.....	蔡 景 (48)
起伏跌宕话广播.....	喻秋生 (57)
略述铜鼓电视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林志明 (66)
铜鼓县地方剧团概况.....	胡敦桃 (74)
我与铜鼓客家山歌.....	胡文峰 (79)
铜鼓急板山歌《翻身卖余粮》的创作与演唱.....	涂雪梅 (91)
一支活跃在苏区的专业文艺队伍.....	胡敦桃 (96)
铜鼓灯彩.....	胡敦桃 (99)
四烈士祠.....	邓新如 (106)
宋纪年石宝墓.....	邓新如 (108)
解放前的铜鼓中学.....	刘中天 (111)

江西省赣西北第一临村中学.....	刘中天 (127)
江西省武宁师范在铜鼓.....	周庆贺 (130)
一场废旧立新的办学斗争.....	王文俊 (134)
旧社会的学徒生活.....	刘刚整理 (137)
医术精湛 誉满杏林	
——卢汉轩老中医传略.....	杨方盛 (142)
解放初期铜鼓的剿匪反霸斗争.....	林志明 (146)
南浔师管区在铜鼓拾零.....	刘刚整理 (158)
铜鼓居民考.....	刘中天 (161)
胡姓源流初探.....	胡清迪 (173)
肖姓之由来 来宁之简溯.....	肖积熙 (175)
铜鼓纸业.....	余树槐 刘刚 (177)
高岭碗厂的兴衰.....	郭月初 (185)
响石的传说.....	林文穆 (186)
相思鸟的故乡.....	钟振华 (187)

自 述

王育万

一、幼年生活

我于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农历正月十八日生于铜鼓县港口乡下坪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家有旧屋数间，田地四、五亩，另有松杉竹木、油茶、茗茶等山地数十亩，家有祖父、父母亲、我和两个姐姐共六人，靠务农维持生活。

一九一六年我才满五岁，父亲得重病，变卖家产，治疗无效病故，留下六十五岁的老祖父和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幸亏我母亲忍受千辛万苦支撑全家，过着半年野草半年粮的极其艰苦的生活。我承继父（父亲的同胞弟弟）在外打长工，赚点钱资助，把我们姐弟拉扯大。我八、九岁时在下坪私塾小学读过两年书，因母亲劳累成疾，无法继续供养我上学。十二岁时祖父病故，为祖父治病和安葬，把几亩地全部卖光，家庭生活越来越苦，被迫把两个姐姐给人当童养媳，只剩下我和多病的母亲两人。我就开始帮人家放牛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一直到土地革命时期。

二、走上革命征途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红五军退出平江县城后，转战湘鄂赣边，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那时平、浏、修、铜、万等县共产党的组织由秘密转向

公开活动，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象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了。我们一些青年人，急不可待，参加革命，我和王青山、王先舫、王彦和、王俊贵等十余人，秘密商量，推选王青山和我去幽居接头。上级党和苏维埃政府派王荣陆和另一位同志到坳背坑王映和家，召集我们上坪、下坪、英朝、笼双等地二十余名贫苦群众开会，指示要我们立即准备建立党支部和乡苏维埃政府。一九二八年农历八月初四由王镜明、王荣陆二同志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党旗就用红纸写 C C P 三个字，代表党旗贴在壁上，入党人对着宣誓。自坳背坑会议后，就正式成立了中共铜鼓县第二区第八支部，支部书记是王杰启，我任组织委员，王青山任宣传委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立即组织了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抽调三十余名精壮队员组织军事训练，由王青山任教练，收集一些梭标、鸟枪为武器，准备随同红军出发到白区打土豪和做发展工作。同年九月上旬召开全乡群众大会，正式成立铜鼓县第二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管辖上坪、黄泥沅、下坪、笼双、万冲、英朝、南流等地。乡苏维埃主席由区苏维埃调一乡（沙洲头）高全兴同志担任，财政委员王香远，土地委员王治元。王青山调第一乡担任乡苏维埃主席。是年冬天，高全兴患病离职后，乡苏维埃主席由我担任。

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旬，红五军正驻扎在幽居休整，准备向修水方向出发，我乡正在训练赤卫队和少先队，配合红军行动。八月九日，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七十七师一营（营长姓丁）和修水漫江靖卫团一部份，由港口方向进收我苏区，一到我乡英朝就开始杀人烧房屋。我们下坪村共有二十三栋房屋，除太保殿未放火外，其他房屋全被烧光。群众事先不知道敌人会烧屋，稻谷、豆子、猪、鸡、衣服、被帐等都未搬出，全部被抢光、

烧光。我家是几间木板旧房，烧起来很快。敌人走后，我们即下山来，房子就已成为一片灰烬。只拿出一床被子，一只水桶，几只碗，还是头天晚上躲兵，在山上睡了和吃了用了的。其他家产全部被烧光，片瓦无存。当地的土豪劣绅纷纷出动，组织民团反动武装。如我王姓所谓族长的大劣绅王尉卿就在港口纠集一些流氓打手成立反动民团，自称团总。他扬言说：“我们姓王的有当‘土匪’的，一个都要杀尽。”敌人烧我们房屋的第二天，反动民团就来我苏区南流、英朝、上、下坪等地捉人抢东西，共捉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三十六名。解至棋坪（反动军队驻地），由王尉卿给敌军丁营长一封信，说：“三十六人皆是匪，没有一个是良民，要立即枪毙。”于当天晚上一次被枪杀于棋坪恒下一丘水田内。

同年冬天，我母亲病故，继父参加红军，只剩下我一人。一九二九年春组织上调我到少共铜鼓县第二区委担任组织委员。一九三〇年三月出席了在祖庄茶盘塘召开的全县第二次党代表会，选举李骏良为县委书记。还在梁家墩坪上出席过一次全县共青团代会，选举涂韶为少共县委书记。

一九三〇年五月，组织上派我到少共赣北分区委团校学习三个月，结业后，分配我到少共修水县第四区（驻渣津潭背）担任书记。同年九月敌人的三架飞机轰炸渣津，发现我们的目标，首先用机枪扫射，接着投掷炸弹，我躲在街背的田垄下，离我十余步的地方投下一颗炸弹，弹片从我头顶飞过，尘土把我埋了半截。

同年十一月，我带领一个连的少共先锋队员，参加黄坊战斗。这次来犯的敌人有一团的兵力，主要进攻湘鄂赣边特委驻地上杉。我军只有红十六军一个营的兵力，其余的都是赤卫队

和少先队，武器都是些梭标、鸟枪，由红军统一指挥。我连任务是埋伏在敌人退路的一个山峰上，当敌人进攻时不动，敌人败退时就冲杀下去，经过数小时激战，敌人节节败退，我军俘虏敌军数十名，缴枪数十支，我少先队连，捕敌兵2名，缴步枪三支。

一九三一年二月，修水县委（驻扎上杉）调我担任少共修水二区委书记（驻洲坡厂），同年秋收斗争时，县委给二区一个任务，就是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组，随同区游击队，在年底以前发展建立修五区。区委和区苏维埃讨论决定派我和周爱德等五人组成工作组，并指定我当组长，率领区游击队十余人枪完成这任务。到冬天发展了马面咀、坑口、湖洲、莫落田、浆潭、雅洋坪等六个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支部，正式成立了中、少共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驻扎马面咀办公。我就担任该区少共区委书记，周爱德担任组织委员兼少先队区队长。

一九三二年三月我下乡到酱潭乡，乡苏维埃主席住浆潭塘上一间小茅屋内。那天晚上在他家开支部会，散会后，我住他家。到第二天早饭边，漫江的清卫团六十余人先把房子包围了。我躲在厨房烟囱头上，未被敌人发现，幸免一死。乡苏维埃主席未跑脱，被敌人当场杀害。

一九三二年四月，省委调我担任少共湘鄂赣省委巡视员（驻扎万载县小沅），先后派我出席少共浏阳县在严坪召开的全县团代会和万载在潭埠召开的全县共青团代表大会。同年七月又派我出席少共宜（春）萍（乡）县第一次团代表大会，同时调我担任少共宜萍县委书记（驻宜春县慈化的赫孟塘）。一九三三年五月我率领该县数十名儿童团员参加全省儿童大检阅，地址是省委驻地万载小沅。评比名列第一，得奖品是飞机

一架（白铁皮做的玩具）、银洋八块。同年秋季，少共县委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县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一百余名，加入少共国际团。后由少共中央巡视员郭潜同志率领，到达中央苏区，编入少共国际师，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三年八月，省委调我到中共铜鼓县委代理书记，因原县委书记邹全昌犯错误离职反省。这时正是敌人对苏区进行五次“围剿”，环境非常恶劣。同年秋天，我出席了在万载小沅阳基洞召开的全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何振吾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我被选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

一九三四年一月，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从万载小沅搬迁到铜鼓幽居祖庄。

这次搬迁途经铜鼓梁家墩。当时，我任铜鼓县委书记。县委驻扎在梁家墩郭岭，县苏维埃驻扎梁家墩祠堂。

县委为了保卫省级机关安全搬迁，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各项任务。我们县级机关的干部，都全力以赴，分配到各地去做发动群众工作，特别是幽居祖庄，要动员部分群众腾出房间，更要做细致工作。我在梁家墩见到省委书记陈寿昌和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汇报了我县敌情和对省级机关搬迁的安置工作。他们听后，都表示满意，说我们布置比较全面。由于沿途苏区党和人民的协助，虽然是在恶劣的环境下搬迁，还是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幽居祖庄。

不久，我就接到省委通知，调我去参加平、修、铜工作团工作。我们这个工作团由省委组织部长黎申夷任团长，我负责组织工作。

黎部长告诉我说，由于敌人疯狂进攻，情况严重，省委在万载小沅决定省级机关向铜鼓幽居转移后，便立即派出一批干

部到各地去工作，组成几个工作团。准备万一打散了，各地还有省委负责同志在领导工作，坚持斗争。省委副书记兼红十六师政委傅秋涛同志和省总工会委员长施济同志带一批同志，到修铜宜奉边去了；省委秘书长钟期光带一批干部到湘鄂边去组织中心县委，由钟期光任中心县委书记，还组织平浏铜和万铜丰工作团。

省委、省苏维埃驻在幽居祖庄时，国民党军队五十师和七十七师一部份，盯着幽居祖庄“进剿”，逐渐在棋坪，礅头一带筑起了碉堡，实行严密封锁。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省级机关和军民经济十分困难，最严重的问题是粮食买不到。只好动员当地群众尽力把自己仅有的稻谷，薯丝拿出来支援省级机关，省苏维埃也千方百计派人到各地买回一些薯丝和笋干。就这样，把浸涨的笋片切细和薯丝拌在一起吃，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士兵都吃这个。有时这样的东西都没有吃，就吃野菜度日。

几个月后，由于敌人实行的碉堡政策，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的进攻更加疯狂。为了适应当时环境，便于开展工作，省委、省苏维埃又决定将省级机关迁往修铜宜奉边的龙门山。当时，省级机关搬龙门山，并没有打算在那里长期驻扎下来，而是想冲出被敌人严密包围的老区，到永修、德安、云山一带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决定在那里召开全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自从省委搬出幽居后，我们工作团在黎申庚同志的率领下，就在平修铜边界进行工作。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交通很不方便，如要得到省委的指示和向省委汇报工作就要靠短枪队跑交通。我们是在平江境内得到省委召开湘鄂赣省党代会的通

知。

我们工作团按照省委通知精神，组织好平江、修水、铜鼓三县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我们九个代表按预定时间在祖庄集合，在铜鼓县苏维埃主席樊金友家住了一晚，弄了一些炒米作干粮，一切准备就绪后。由省短枪队三个同志护送我们上路。出发的准确时间现在记不清了，大约是古历六月下旬。

一路上，我们白天睡山上，晚上出来走，经过上沙港，上坪坳、油沅、西向，三都，大墩的双坑等地。巧妙地绕开敌人的阻拦，于第三天到达了官山。又爬了一夜山路，天亮后沿着山顶的小路朝龙门山方向前进。随后改道往宜丰县潭山有树林的那边走去，才看到树丛中有个茅棚，有一个老人见到我们就跑。短枪队便上前抓住他，对他说：“你不要跑，我们不打你，也不杀你。”看来只有他一个人，又对他说：“我们相信你不是坏人，我们是来找省委的。”于是拿出介绍信给他看。他才告诉我们，他是乡苏维埃主席，山下站不住脚，只好一个人住在这里。他说：“省委被敌人围困在山里，还要经过两个碉堡才能到达。”于是，他将通往省委的路线、地点详细地告诉我们。

因为两天没有吃饭，我们还在那里买了点米煮饭吃，又洗了一个澡。之后，黎申庚便找大家商量了一下当前的行动计划：决定他和短枪队政委以及我三人先去找省委，其他九人就留在原地。并且郑重地叮嘱他们，这里是大山之中，荒无人烟，眼下敌情严重，不要走到别处去，特别要提高警惕，晚上必须站岗。又约定第二天晚上来接他们。

吃了晚饭，我们三人动身出发，按照那老人提供的路线前进。前而不远处，就有一个敌人的碉堡。我们在灌木丛中，看

到碉堡四周，砍光了树木，只剩下树桩。一个匪兵在碉堡顶上有规律地慢慢转动着。

我们决定一个一个地通过去，万一被发现，也可以减少牺牲。如果打散了的话，也不要走的太远，过去后，以拍掌两响为号，再集中前进。

短枪队政委和黎申庚都带有短枪，他们要我走中间。我们每人通过时都只距离碉堡十几丈远，眼睛死盯着碉堡上的哨兵，让其转到看不见我们时，就迅速前进，快到可以看得我们时，就蹲下，假装树桩。就这样三人都安全地通过了这个碉堡。

过了大约五、六里路又是一个碉堡，我们仍然用这个办法通过去了。从出发时大约走了三、四个钟头，大概到达龙门山靠修铜宜奉四县交界的地点，已经是深夜了，到底是什么地方，黑夜里辨认不清方向，我们只得摸索前进。

经过几天几夜的艰难跋涉，终于找到了省委。进入省委驻地时，省委在山排上设了一个排哨，架着重机枪，喊话：“哪一个！”我走上前去接话，并拿出介绍信，接上头后，哨兵才让我们上去。

黑沉沉的大山中，连茅棚都没有一个，地上到处熟睡着我们的同志，在地上挖个洞架锅，炊事人员正在做饭。省委书记陈寿昌身体不好，脚正在发烂。他坐着斜靠在一个竹凳旁边的树上，看上去痛苦的很，打不起精神。

陈寿昌同志听取了黎申庚的汇报后，说：现在敌情严重，会开不成了。省委决定今晚四点钟出发，向湖南边界转移。你们赶快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队伍出发时，省保卫局长邓洪通知我们同他一路去。这一

路是邓洪带队。其他几路怎么走，没有告诉我们。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陈寿昌同志了。

我们这一路大约二、三百人，有部分是机关家属，前面走的是红军，后面是家属，邓洪和我们走在队伍中间。

仍然是沿着我们来找省委的原路线行进。如果遇着敌人的碉堡，前面的红军，就派兵把它围起来，掩护着队伍通过。敌人见是大批红军部队也不敢轻举妄动，躲在碉堡不敢出来。

在离我们留下九个同志的那老人茅棚不远处，短枪队政委带了两个士兵去接他们，但事情出人意料，他们回来报告说，茅棚被烧毁，那里倒着几个同志的尸首，但看不清牺牲的是哪些同志。一听到这话，我们大吃一惊，心如刀绞。黎中庚说：

“现在没有办法掩埋这些同志的尸体，只有随着部队走，否则就冲不出去了。”

当天夜里，一位留在那里的短枪队员脱险后，在双坑山上找到我们。他说，在我们走后的当天晚上，就遭到了敌人的包围，一阵乱枪响起，茅棚就被烧着了。他从睡梦中惊醒，立即从棚边滚下山坡，逃出来了，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队伍走到大堰的双坑，天已经亮了。这时碰到了敌人，大约一班人，埋伏在我们经过的田坎边，对着我们射击。我走在邓洪前面，他后面的警卫员脚上中了一枪，幸亏红军立即包抄上来，从上而下，才压住敌人，迫使敌人退到碉堡里去了。

那天上午行至三都，又遇到大批敌人阻击。据说，驻铜鼓的敌军也开来了，双方打的很激烈。经过数小时激战，我们虽然通过三都，但是我军损失很大，湘鄂赣一台无线电机关丢了，台长也牺牲了。

我们队伍到达幽居祖庄后，红军驻扎上沙港，省级机关驻

扎祖庄。当天晚上敌人就来进攻我们。在上沙港发生激烈战斗，敌我双方伤亡较大。在多于我们数倍的敌人进攻下，我们的队伍被迫退向大龙山一带。

邓洪在三都战斗中和我们失散了，只身遇险，过了几天以后才回到祖庄。

以后，敌人就住扎幽居，在那里建筑碉堡，烧山、焚屋、杀人、强奸，无恶不作。

我们这路的同志就上了大龙山，同敌人周旋。一天下午，在祖庄靠绿竹洞的一个荒屋坪上，黎申庚和邓洪两人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和修水县委书记樊明德、铜鼓县苏维埃主席樊金友、铜鼓保卫局长方兆生、保卫局侦察股长方虞生等。在会上黎申庚传达了省委指示，决定修、铜两县合并。修水和铜鼓两县委相应消失，平修铜工作团撤销。正式成立修铜县委和县苏维埃，樊明德任县委书记，樊金友（不久后叛变）任县苏维埃主席。省委决定留下我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吴泛舟担任宣传部长兼少共县委书记，方兆生担任保卫局长，方虞生担任县总工会委员长。

会议结束后，黎申庚和邓洪同志当天晚上就带领队伍离开铜鼓幽居往湖南边界去了。此后，我们就在修铜边界同疯狂进剿的敌人展开了更加艰苦的游击战争。

在敌人五次“围剿”后期，我们县委机关被敌破坏，樊明德同志被叛徒出卖而牺牲，樊金友投敌叛变，我与组织失掉联系后，逃至异乡地主家打长工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一直到一九四九年铜鼓解放。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家的房屋被敌人烧光，财产被抢光。父亲一九二八年参加红军独立团，一九三二年在修水县的双港

与敌作战阵亡，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当时是敌强我弱的时候，党和苏区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战争压倒一切。苏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红军到白区打土豪筹款，其次是收点农业累进税，加之敌人对苏区经济的严密封锁，因此，苏区经济是十分困难的。那时官兵一律平等，都不发工资，每人每天发五分钱菜金，吃饭靠农业累进税收些稻谷或红薯丝。环境好的时候，有时能分到几角钱的火食尾子。环境恶劣时，五分钱菜金也无法保证，几天吃不上饭是常事，特别是在敌人五次“围剿”中更为严重。我参加革命的这些年里，只有在修水渣津工作时，才穿过一件棉衣过冬，其他冬天都是穿单衣度过的。在敌人五次“围剿”后期，被敌人围困在大山内，几个月没有吃过一点盐，有时几天吃不到一条红薯丝，就在山上寻些野生杨梅，桃李和竹笋充饥。有病或体弱的同志，这些东西吃不下去，就活活的饿死了。

任何敌人是征服不了一个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我失掉组织联系后，我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共产党、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所以，我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来衡量和约束自己，宁可受到行动自由的限制，没有领过国民党的白符号。一九四二年农村的甲长无人愿当，采取每人轮流当一个月的办法，轮到我头上时，我就出了四个工日，请老甲长黄陆皆代当一个月。在那时候，当公开活动有困难时，我就在一些打长工的朋友中，利用上山或下田干活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打长工的人都是无钱讨老婆的，我宣传共产党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讨老婆不要钱等政策，这对他们影响很大，都说，如果共产党能打回来多好啊！解放后，这些人有的当乡村干部，

有的参加了解放军。

三、铜鼓解放了，我重新走上革命征途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铜鼓县城解放了，苏区人民重见了天日。当时我住棋坪乡的黄泥场，离县城六十多华里。当天下午听说铜鼓解放了，望眼欲穿的日子到来了，使我激动得流下眼泪。晚上怎么也睡不着，天没亮就吃好了早饭向铜鼓跑，来找党的关系。中午时分就到了县城，看到的都是全副武装的过往军队，也看到沿途张贴的约法八章的布告。我问了几个同志，问他们晓不晓得有住铜鼓的军队和干部吗？他们都说不知道。我只好向回走。过了几天又听到伪保长说，二野政治部已到铜鼓，我又第二次来到铜鼓，在奎光书院找到一些养伤病同志。我问他们有没有看到铜鼓的干部，其中有一个军官模样的同志说：“有，可是现在还没有到，大约要几天后才会来。”要我等事过几天再来。又说他们是在这里休息几天，病好点就要上前线去的。第三次来铜鼓时间，大约是七月二十四、五号，在奎光书院找到县人民政府，接待我的是陆维同志。我问周县长在吗？他说，不在，有事出去了。旁边一个同志说，你有事就向他说，他是县政府的秘书。我就向秘书说：“我是棋坪人，离这里六十余里，铜鼓解放这样久，还没有一个解放军去棋坪。几个土匪头子，还在逼租逼债，准备上山当土匪。”我又说：“我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苏区干部，在敌人五次围剿中被打散，失掉组织联系的。”陆维同志说：“你来得很好，我们正想找到你们这样的同志。我们渡江时毛主席说过，南方好多地方都是老革命根据地，留下许多同志在那里。要我们到了南方，向这些同志问好，要他们继续出来为革命工作。”陆维同志又问了我的详细住址和姓名。我写了给他后，

他又问了一些棋坪等地的具体情况。最后向我说：“如果你是真正的老同志，就要从工作中来表现，给你的任务就是回去协助保长借粮支前，最重要的是摸清那几个土匪头子的一切情况，盯住他们，不得让他们逃跑。情况如有变化就立即报告县政府。今后我们会派人来找你们的。”

不久，县政府派建设科长孙章同志率领解放军九连进棋坪剿匪，直到黄泥坳找我，我带着解放军，一枪未响把王健等三个土匪头子活捉了，缴长短枪十余支，炸弹和子弹数箱。然后，棋坪工作团才进棋坪开展工作。八月县委正式通知我参加棋坪工作团工作。

一九五〇年五月召开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选举我担任县农协组织部长。丰田区土改试点结束后，一九五一年五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县委调我担任大墩区人民政府区长。一九五二年五月至同年九月在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学习。一九五二年十月至五三年一月担任铜鼓县政府副县长，一九五三年二月至一九五四年三月担任县长，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一九五五年六月担任中共铜鼓县委书记。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江西省工农干校学习文化，结业时取得初中毕业证书。一九五七年一月至同年十二月任中共铜鼓县委书记（名列邹国逸后），同年六月出席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六月十二日在北京怀仁堂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调南昌专署担任林业办公室主任，后迁宜春改为宜春专署，撤消农林水办公室，改为农林垦殖处，我担任处长。一九六六年四月担任宜春地区林业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一九六六年因我爱人回铜鼓娘家探亲，病在铜鼓，精神失常，